

复印报刊专题资料合辑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毛泽东  
著作、傳記与活动

1964年4—6月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大学附屬剪报資料圖書卡片社

1964年·北京

## 說 明

- 一、本册合輯的是我社1964年4—6月选輯复印的报刊資料，这些資料选自《人民日报》等37种报纸和《红旗》等79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綜合性刊物（包括一部份大专院校的学报）。
- 二、合輯本以复印資料的专题为单元进行合訂，資料少的两个季度合訂一册，資料多的一个季度分装几册。
- 三、合輯本前面有按資料內容編制的索引，作为合輯本的目录，供查閱用。

#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 必須通過暴力革命

——讀列寧《國家與革命》一書的筆記

葛 林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正確認識革命和國家政權的關係，對於規定黨的戰略和策略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以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全部學說的基础，正因為如此，一切修正主義者都拚命曲解和攻訐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思想，以達到取消無產階級革命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的卑鄙目的。所以對待暴力革命的態度，歷來是馬克思主義者與修正主義者鬥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就是為了捍衛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結論駁斥考茨基的所謂和平過渡論而寫的。在這本書中，列寧不但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做了全面深刻的論述，並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徹底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思想。

列寧這本書是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寫成的。當時，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

帝國主義所固有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的矛盾都空前尖銳起來。壟斷資產階級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使“國家同擁有無限權力的資本家集團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殘酷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sup>①</sup>同時，在資產階級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下，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勞動群眾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所抱的態度，已經成為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了。”(371頁)在俄國七月科爾尼洛夫發動叛亂，資產階級正以武力來消滅工農革命力量，當時階級鬥爭的形勢，或者進行武裝鬥爭，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使革命得到勝利；或者是屈服於資產階級暴力放棄武裝鬥爭，使革命遭到失敗。所以要不要進行暴力革命，已經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

<sup>①</sup>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5卷，第371頁。

以下凡引自或轉引自該書的引文，只在引文後面括弧里注明該書的頁碼，不再附注。

命斗争，特别是俄国革命斗争成败的决定性关键。

正是在这个时候，效劳于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相互掠夺的战争中，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使工人群众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相互厮杀；另一方面在国内则完全宣扬“劳资合作”，美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妄想通过和平过渡来实现社会主义。为了替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学说进行“修正”。这种修正来去两方面，即一方面他们公开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工具，把它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调和机关。另一方面如考茨基，他在口头上承认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承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他反对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因此“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372页)“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说。”(373页)

由于考茨基“修正”的手法比较巧妙，同时考茨基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把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控制着第二个国际，并且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誉，这就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更大的欺騙作用，所以列宁不能不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考茨基。

## 二

列宁在这本书中，首先从国家的阶级实质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国家既不是如奴隶主和封建主所说，是根据什么神意产生的；也不是如资产阶级学者所说，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所订的“社会契约”，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我们知道，国家是使用暴力强迫这一部分人服从另一部分人的特殊机关。在原始社会里，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没有剩余劳动可供剥削，不可能产生彼此对立的阶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必要设立这样的机关。同时人们劳动连自己消费还不足，也不可能供养这些脱离生产的常备军和官吏，因而在原始社会并没有国家机构。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社会逐渐分化为对立的阶级——奴隶主和奴隶。奴隶主为了追求自己的享乐，对奴隶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奴隶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不得不进行反抗，两者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在这个形势下，人类命运的发展，不是长此斗争下去导致同归于尽，就是根据强者的利益，建立一种特殊的机关，以武力来压服弱者，使其服从强者的利益。阶级斗争的结果表明，奴隶主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和官吏。这个机器以社会全体的代表的名义来保护已经形成有利于奴隶主的剥削制度和“秩序”，使奴隶主由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变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从而保障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国家并不是超然于阶级之上的调和机关，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高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

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脫离的力量，就是国家。”(374頁)

国家既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剝削階級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把剝削制度巩固下来，同时又緩和、控制階級冲突，鎮压被剝削階級的革命斗争，保持剝削階級的利益。所以“国家是階級統治的机关，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冲突得到緩和。”(375頁)历史上不论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都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超階級的所謂“人民国家”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和剝削階級的专政有根本区别，它是絕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但它在本质上同样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关，是无产阶级鎮压剝削階級，实现自己統治的工具。恩格斯早就说过：“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暴力鎮压敌人的一种暂时机关，那末所謂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无稽之谈。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427頁)所以修正主义者把国家说成“超階級”的階級調和机关，这就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階級实质。在他们看来，国家所建立和維護的“秩序”就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緩和和冲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压迫階級用来維持統治的手段。这是十分荒謬的。

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鎮压被剝削階級的反抗，保证他們法权的执行，作为国家主要特征，就是特別武装部队的建立，并按地区划分行政統治，設置层层の統治机构和官吏。常备軍、宪兵、警察、偵探、法庭和监狱，这一切就是構成国家的統治力量。

剝削階級掌握了这样的强力机构，就可以提出一套法权规范，把他們的意志和階級

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用国家机构强行貫徹。所以法律也不是为修正主义者所吹嘘的是什么“公正”的体现，而是統治階級利益的集中反映。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要进行頑强的反抗。一定要用他們的上层建筑来保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上层建筑最主要的杠杆就是国家机器即常备軍和官吏。列宁说：“官吏和常备軍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蝕着这个社会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395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就会利用这个暴力机构来鎮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从而无产阶级也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全人类。列宁说：“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軍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因为軍队是保护旧制度的最頑固的工具，是維護资产阶级紀律、支持資本統治、保持并教育劳动者去作資本的奴隶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軍队同时并存。”①

国家既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是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工具；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維持自己的統治，最主要是由于他們手中掌握的这个暴力机器，对无产阶级的反抗进行残酷的鎮压，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須通过暴力革命。”“必須不断教育群众，使他們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馬克思和

①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5頁。

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388頁)

### 三

列宁不仅从国家的阶级实质上，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得出和坚持暴力革命的思想，是怎样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这个不朽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了天才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同时还指出这个灭亡不是自发的到来，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他们说：“当我们叙述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一般阶段时，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里多少带有隐蔽性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变成公开革命，那时无产阶级就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列宁指出，马克思这里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获得解放，而“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强力组织，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392頁)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对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做了总结，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

家机器的结论。在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表现出英雄的革命精神，成为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决定力量。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还不成熟，它对资产阶级怀有极大的幻想，自愿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加紧对无产阶级进攻，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在六月廿二日举行武装起义，这个起义经过四天的奋战，最后是失败了。马克思从这个失败中得出极其宝贵的教训，它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是什么阶级调和的机关，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无产阶级想要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是一种幻想。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sup>①</sup>

马克思从法国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到波拿巴政变的过程，指出了这些阶级和政党胜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否掌握官僚机构和军队。马克思说：“那些争夺统治权的相互更替的政党，把夺取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看成是自己胜利时的主要战利品。”(393頁)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在封建制度崩溃时代产生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它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只要夺取并进一步完备它，以求适合自己的统治。而无产阶级革命是根本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对于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强大暴力机器，无产阶级绝不能简单的夺取它和改良它。“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頁。

些人的手里，而應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402頁)

所以列寧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還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這裡，問題已經提得具體了，還做出了非常確切、肯定、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但是這個機器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393頁)

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最偉大的歷史功績，就是它摧毀了舊的國家機器並以新型的國家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公社第一道法令，就是取消舊的軍隊、憲兵和警察，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裝國民軍。公社廢除了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和政治上的等級制度，所有的公社委員和公社的一些工作人員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出來的。為了防止政府官員鑽營祿位或變質脫離群眾，公社規定所有政府人員每人每年薪金不超過普通工人工資，實現真正廉價政府的口號。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從巴黎公社經驗總結中得出了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國家組織，同時還根據公社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共產黨宣言》做了唯一的修改。他們說：“特別是巴黎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401頁)必須以暴力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在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這個時期，國際上沒有發生什麼戰爭，國內沒有發生什麼革命，這是一個“和平時期”。這種暫時的“和平”時期，有利於右傾機會主義的滋長。形形色式的修正主義出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其主

要矛頭，就是指向暴力革命。這時恩格斯為了反對機會主義，提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刊物上發表《哥達綱領批判》，給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寫了一篇序言，強調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摧毀一切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在《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中對黨內改良主義的“議會迷”“乞求”和平的機會主義者進行了嚴厲批判，指出無產階級要破壞舊制度，建立新制度，必須用強力衝破舊制度，正好比一個鰲蝦對他所寄生的舊殼感到容納不下去時就得破壳一樣。

從以上可以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寫《共產黨宣言》起直至逝世，畢生一直堅持和頌揚暴力革命，認為以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這種頌揚決不是‘迷戀’，決不是誇張，也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不斷教育群眾，使他們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础。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動忘記了。”(388頁)

#### 四

列寧不僅在論述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時，對機會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還在第六章對考茨基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觀點進行了集中批判。

考茨基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敵對政府的勝利)“不能導致國家政權的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力量比較的某種變動……因此，我們政治鬥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數的辦法來奪

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476頁)又说“革命本身預定要有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改变我們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466頁)

考茨基鼓吹这些謬论的“论据”，在政治方面就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所謂“純粹民主制”，抹煞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所以在这个共和国里，“全体成員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无产阶级由于占人口大多数，就能够通过选举爭得议会的多数，掌握政权，改变“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社会主义，显然，这是十足的欺騙。

资产阶级国家有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形式。在民主共和国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还有一定程度的集会、結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这对无产阶级斗争有一定的便利，所以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的工人应该为爭取民主共和而斗争。但是，民主共和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国家实质。列宁说：“民主共和制度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十分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員，机关或政党的任何更換，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380—381頁)

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工人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因为民主就是参加国家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既然是他們統治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民主权利。所以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449頁)考茨基吹嘘的什么普选制，实际上并不“普”。资产阶级以居住年限、财产、文化程度、人种等等来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利，“对穷人的这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細

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推出和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447頁)

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在群众的斗争的压力下，有时不得不給工人某些民主权力，但这决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是为了保护他們的統治不得不做出暫时的让步。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政党在选举中，也可能得到較多的选票，但并不等于在议会中就能占据多数席位，因为资产阶级可以采取种种手段，例如宣布选举无效，修改选举法，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解散议会，或者资产阶级几个政党实行联盟使共产党不可能成为议会中的多数。

退一步说，就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取得了议会的多数，也不可能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并不在于议会，而在于他的常备軍和官僚机构。只要这个机构还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他們就可以随时解散甚至取消议会。列宁说：“請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为了愚弄‘老百姓’专门从事空谈”(410頁)又说：“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409頁)所以资产阶级议会并不是如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吹嘘的那样，是什么最高权力机关，而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政府官僚手里。在保留资产阶级常备軍和官僚机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议会选举，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暴力革命就能夺取政权。列宁说“只有



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偽，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sup>①</sup>

考茨基宣扬和平过渡在经济方面的“论据”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之間可以达成协议，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垄断组织，这样就可以代替彼此之間的掠夺和战争，从而进入所謂持久和平的时代。修正主义者特别大肆吹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通过这种资产阶级“国有化”可以实现“计划经济”，可以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

其实，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加剧了帝国主义相互之間矛盾，国有化也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国家作为統治阶级的工具，不仅在政治上以暴力镇压被压迫阶级，同时必然从经济方面，利用一切可能来帮助統治阶级剥削被压迫阶级。因此，不论是奴隶主的国家，封建地主的国家，他們都有某些“国有化”的经济。所以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首先应该弄清国有化的性质，属于什么阶级的国有化。

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直接控制国家机构，利用国家机构来保证垄断组织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和巩固财政寡头的統治。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使得整个国家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門集中在

少数垄断组织手中，他們控制着整个经济命脉。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应付当时正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摆脱自己的困境；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調整垄断集团之間的矛盾，这就不仅可能而且必須把国家政权和垄断资本紧密結合起来。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沒有改变资本所有制的性质，减轻资本家的剥削，反而为垄断组织提供最大限度的利潤。这里沒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更不可能通过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寧说：“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錯誤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們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們有计划地調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这是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緩，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飾资本主义的言论。”(429—430頁)

考茨基为了反对暴力革命，在理论上抹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頁。

黨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論断，同时，对馬克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可能和平过渡的設想进行曲解，把馬克思、恩格斯描写成反对暴力革命者。列宁揭穿了這個欺騙。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确說过英、美可能实现和平过渡。馬克思說：“我們也不否认，有象美国、英国这样国家，如果我更好地了解了你們的制度，我也許会把荷兰补充到这样的国家里去，这些国家的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即是这样，我們也必須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里，作为我們革命杠杆的应该是暴力：暴力才是我們在一定时期所要采取的手段，以便最終地建立劳动統治”。①馬克思这里把欧美各国分为两种类型，认为大陆以外少数国家可以通过和平道路，大陆上則必須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馬克思关于英、美可以和平过渡的設想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英、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即常备軍和官僚机构还未完备起来，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种例外的情況已经不存在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官僚机构都已经空前加强起来。列宁說：“借口馬克思在70年代曾經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詭辯，通俗一点說，这是用引证来騙人。第一，就在当时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軍閥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②“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打碎、摧毁‘現成的’（1914—1917年間，这两个国家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

一次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403頁）因此，考茨基这种曲解是十分荒謬的。他把馬克思的个别提法扩大为普遍真理硬搬到帝国主义时代，以和平过渡来代替暴力革命，阉割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馬克思、列宁一直強調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但他們也曾說过：如果和平过渡可能的話，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共产主义者很少反对这样办”。但是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现实教导我們，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剝削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們总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常备軍和官僚机构，首先动用武力来残酷地鎮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因此，在这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必須以革命的暴力打败反革命的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列宁指出：真正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方針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过渡的片面估計上面。必須同时准备两手，即既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更要准备非和平的发展。并且应该把立足点放在暴力革命上面，以暴力革命的思想把群众武装起来，以便在反动派一旦动用武力的时候，能够以革命的暴力击败反革命暴力，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著作发表离开今天将近半个世紀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① 《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中国人民大学叢書，第264—265頁。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91頁。

的历史充分的证明这是一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巨作。

列宁的这本书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战斗性的著作，这本书不但从理论上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歪曲，并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正如列宁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序言中所说的，“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他用机会主义曲解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这种曲解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详细的揭露”①。

列宁这本书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指出了行动方向，规定了任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思想的指引和列宁的亲自领导下，继续了巴黎公社的事业，举行了武装起义，彻底打碎了旧俄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新的国家机器，从而使国家由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光辉的胜利”②。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如果中国人民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军阀、官僚、特务的国家机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要取得胜利，乃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

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③。又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④。

除了苏联和中国以外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胜利也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的。这就更加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应遵循的共同道路。修正主义者反对暴力革命的所谓和平过渡已经狂吠了几十年，可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铁面无情的，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和平过渡的先例。事实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人。考茨基的和平过渡理论在这事实面前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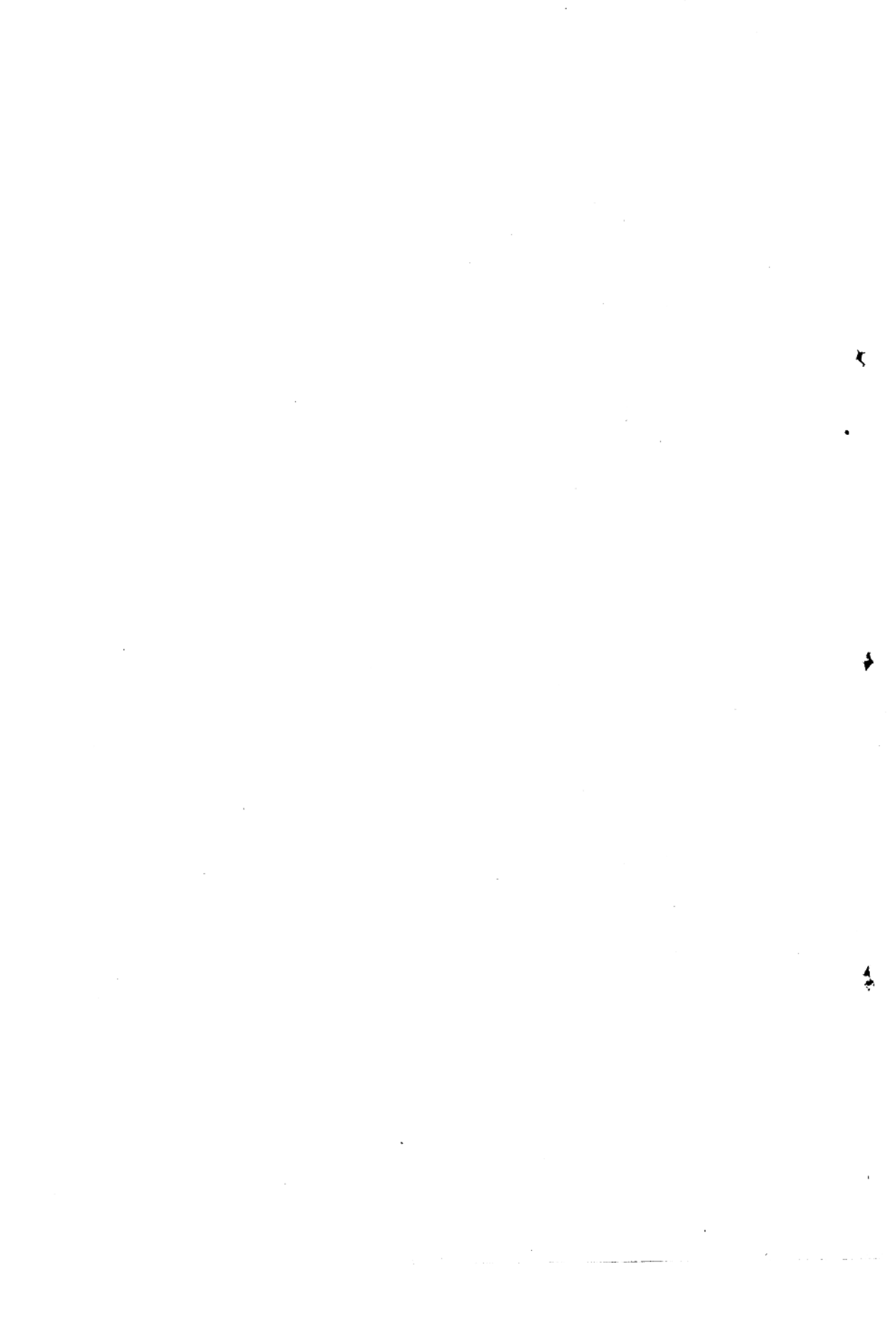
现在，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革命形势，但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会“卖刀买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因此，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伟大著作，对于当前的革命斗争，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战斗的现实意义的。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页。

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

④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版，第577页。



## 怎樣理解列寧這段話？

鄧克生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寫的《十月革命四周年》這篇文章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要經過多年的準備工作），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許多過渡階段。不是直接依靠熱情，而是借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個人利益、依靠經濟核算，在這個小農國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達到共產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把千百萬人引向共產主義。”①

列寧說的這段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對列寧的這段話，由於認識的不同或立場的不同，因而就會在理解上產生分歧：正確的理解和不正確的理解。如何正確地理解這段話，這不僅是涉及到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的重要問題，也是當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因此，我們不能不把它弄清楚。誰都知道任何真理，如果加以主觀隨意性的解釋，就會導致荒謬的結論；同時，正如列寧所教導的，真理再往前一步，那怕是向同一方向走的一小步，真理也會變成謬誤。在這裡，我只是就平時學習中的點滴體會，提出一些個人見解，如有不對的地方，歡迎同志們批評指正。

首先，列寧是在什麼樣的時間、地點、條件下講這一段話的呢？如果我們不把這一點

弄清楚，就很難正確理解列寧的原意。

我們知道，列寧寫《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的時候，正是蘇聯開始由軍事共產主義轉到新經濟政策的時期。是蘇聯經歷了一個歷史上的大飛躍以後，暫時有計劃地後退一下，以便準備另一個大飛躍的時期。這是蘇聯歷史上的的一個重大轉變關頭。在這轉變關頭，在幹部思想中普遍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呢？這就是在過去幾年的殘酷的軍事鬥爭中已經激發起來的革命熱情，使很多人都想直接依靠這種熱情，用沖擊的辦法去消滅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用軍事共產主義的辦法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他們高度的革命熱情是值得欽佩的，但是，他們缺乏冷靜的頭腦，不懂得農民的性格，不懂得小農經濟的特點，不懂得在經濟上如何“隨機應變”地照顧農民的個人興趣和個人利益。一句話，他們不懂得經濟工作具有和軍事、政治工作不同的性質或特點。他們不懂得，如果以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做軍事、政治工作的辦法來做經濟工作，就會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關係搞翻。如果搞翻了和農民的關係，這是異常危險的——會招致滅亡的危險。列寧正是針對這一具體的思想情況，為了對幹部進行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教育，為了號召幹部把頭腦冷靜下來，才寫了《十月革命四周年》這篇文章。我們要正確地理解列寧所說的這一段話，就必須同時學習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前所發表的

① 《列寧選集》第4卷，第598頁。著重點是我加的。

一系列的重要文章(如《论粮食税》、《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政论家的短评》等),看看列宁是怎样全面而系统地来论述这一问题的。

列宁在当时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中,反复说明了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原因。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先作一个简短的回顾。

苏联在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前,由于军事情况紧张,苏维埃政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不仅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全部收集起来,有时甚至把农民所必需的食粮也当作余粮收集了。而在余粮收集以后给予农民的是什么呢?在政治上是许诺他们实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一张不兑现的纸币——卢布。当时,农民听到共产主义,在政治上是满怀希望的,但他们手中的纸币,不但不能兑现,而且买不到工业品,因为当时供应的工业品极其缺乏。这在经济上对于农民的个人利益的确是极大的损失,其结果严重地影响到农民的个人兴趣,从而影响到整个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尽管如此,在当时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农民还是忍受了这种困难,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忍受这种困难,不把余粮拿出来支援前线,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为了光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忍受了空前未有的困难。但在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白匪帮被击溃了,帝国主义反动派被打垮了,国内战争结束了。形势既变,条件也变,如再继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继续实行余粮收集制,继续凭“革命热情”干下去,农民就不仅不会同意,而且会起来造反。因此,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从经济上照顾农民的个人利益,鼓舞农民在生产上的个人兴趣,从而才能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正如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回顾形势时所说

的那样:“到了一九二一年,当我们渡过了而且是胜利地渡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sup>①</sup>

实行一种对农民让步(或退却)的新经济政策,从经济上照顾农民的个人利益,提出不要直接依靠革命热情,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就只要讲物质刺激,不要讲革命热情或政治挂帅呢?是不是说,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提高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防止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腐蚀,就是多余的事情呢?不,不能这样来理解问题。

拿政治和经济比较起来,政治,不能不居于首要地位,这是列宁一贯的思想,也是列宁的最主要的思想。如果不发扬人们的革命热情,那和列宁一贯的思想怎样取得一致呢?是不是列宁在后来改变了主张呢?我看不能这样说。就在列宁写了《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以后不久,列宁在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草拟决议时,就写了如下一段话作为全会决议的结语:“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在工会中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流派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这种现象,加强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sup>②</sup>

可见,列宁是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的。

对农民实行让步的政策,是不是就只讲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而不必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呢?

照我看来,即使是在对农民让步的时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4—695页。

② 同上书,第618—619页。

也只是在經濟政策上讓步，而不是在思想戰線上讓步。在思想戰線上，還是要組織力量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當然在進行教育的時候，要注意把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的界限劃清楚，不要把社會主義誤認為共產主義，不要把在社會主義階段實行的經濟政策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和教育混為一談。列寧曾說：“現在資產階級國家正不斷努力設法麻痹城市工人，驅使國家、沙皇政党和資產階級政党出錢办的种种报刊來為這一目 的效勞，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利用我們的政權把城市工人真正培養成在農村無產階級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sup>①</sup>

由此可見，那些把列寧的話理解為不要講究革命熱情，甚至進一步理解為不要對群眾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列寧的原意的。

那麼，對於列寧所說的“借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這句話，又應當如何理解呢？是不是把革命熱情放在次要的或輔助的地位呢？不，不能這樣理解。

我認為，列寧這句話的中心意思是，教導我們要把革命的熱情和冷靜的頭腦結合起來，不要單凭一股熱情和干劲去辦事。

在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初期，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文中就已指出：“我們的力量在於能對俄國和國際一切現存階級力量作十分清晰和冷靜的估計，其次就在於由此產生的進行鬥爭的鋼鐵毅力，堅定意志，果斷氣魄和忘我精神。”<sup>②</sup>

可見，列寧正是從兩個方面來全面地說明問題的。怎麼能夠把它片面地理解為不要革命熱情呢？

此外，列寧在《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的文章中，既說到了物質方面，也說到了精神方面，他說：“所謂精神方面堅持下去，就是不要使自己精神渙散，組織瓦解，要保持對情況的清醒估計，保持勇敢和堅毅的精神”<sup>③</sup>。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列寧是始終一貫地重視革命熱情，從來沒有忽視過。列寧所要求人們的是既有革命熱情，又有冷靜的頭腦。這與我們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熱情要與科學精神相結合，實際上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要說列寧不贊成“革命熱情”的話，在我看來，有一種“革命熱情”的確是列寧所看不起的，是列寧所諷刺過的。

在俄國，曾經出現過一種“空談司令”，這種“空談司令”，講起話來，滿口是動聽的革命言辭，“革命熱情”很高，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不肯老老實實地去做點有益於人民的革命工作。對於這種言論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的“革命熱情”，列寧認為不需要，我們也認為不需要。列寧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廿七日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時，狠狠地批評了這種“空談司令”，並且指出：“資本家為了發財致富，同農民建立經濟結合；你為了加強我們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應該同農民經濟建立結合。你比資本家占優勢，因為政權在你手裡，許多經濟資料在你手裡，只是你不善於利用這些東西，你應當清醒一些觀察事物，拋棄浮誇心理，脫掉華麗的共產主義外衣，老老實實地學着作些平凡的工作，這樣我們就一定會戰勝資本家。”<sup>④</sup>

從這一點看來，列寧是主張把那些加了引號的“革命熱情”和“華麗的共產主義外衣”都拋到垃圾桶裡去。

總之，我認為列寧所說的不要直接依靠革命熱情，就是不要單純依靠革命熱情。所謂借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就是要把革命熱情和冷靜的頭腦結合起來，絲毫不包含有對任何真正的革命熱情的貶謗。

列寧所說的依靠個人興趣和個人利益，這是什麼意思呢？

① 《列寧選集》第4卷，第713頁。着重點是我加的。

② 同上書，第562頁。

③ 同上書，第607頁。

④ 同上書，第680頁。

我认为列宁说这番话，主要是为了扭转当时在执行政策中的一种错误或偏向。苏联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执行余粮收集制的时候，由于余粮收集过多，由于没有工业品去和农民进行交换，过分损害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从当时情况来说，纠正这种偏向是最主要的任务。在这里没有必要来讨论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但我们知道，在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历来是最坚决地反对个人主义的，怎么能设想伟大革命家的列宁会只讲个人兴趣和個人利益呢？怎么能够设想列宁会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呢？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讲过很多，我就不必一一引证。在这里，我只引证一下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初所写的《论合作制》一文中，就当时俄国为什么要提出照顾个人利益，以及关于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所作的说明。他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又说：“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sup>①</sup>

由此可见，那种把列宁所讲的话理解为个人利益至上的人，实在是大大地曲解了列宁的原意，是对伟大列宁的侮辱。

为了照顾个人兴趣和個人利益，苏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不仅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并且将自由市场开放了，让农民能够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即允许农民有贸易上的自由。这一措施也是完全正确的。

开放自由市场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因为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过的。但是，允许贸易自由，是不是对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也可以放任不管呢？我们说，这是万

万不能的。但是，醉心于物质刺激的人却说，投机倒把不正是个人兴趣和個人利益所关注的么？怎么可以去管呢？

我们知道，列宁所主张的个人兴趣和個人利益是有一定范围的，不是漫无限制的。超过了国家所允许的范围，那就不是正当贸易，就是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对于这种犯罪行为，国家不但不会照顾他的“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而且要给以最严厉的国法制裁，任何宽容姑息都是不对的。这一点，列宁说得非常肯定而坚决。

列宁说：“怎么办呢？难道宣布投机活动可以不受制裁吗？”

不。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物行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统计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事实上要比从前更严厉三倍地加以惩办）。<sup>②</sup>

由此可见，如果因为列宁说了一句依靠个人兴趣和個人利益的话，便把个人利益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甚至企图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为投机倒把等等资产阶级犯罪行为作辩护的借口或依据，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总之，我们今天对于列宁所说的依靠个人兴趣和個人利益这段话的理解，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首先从国家、集体利益出发来考虑和认识问题，决不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或本位主义的立场来考虑和认识问题。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附带说明一下：

这篇文章是为了阐明列宁所讲的这一段话的原来意义，为了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用列宁的话来说明列宁的原意，以免和原来的意义走样，因此，较多地引用了一些列宁的原著，看起来不免囉嗦一些，请读者原谅。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5—716页。

② 同上书，第558页。



## 關於毛主席《到韶山》詩中“黑手”一詞的解釋

本刊今年二月號發表了佛雄同志的《風雷起大地，日月換新天·談毛主席詩詞十首》一文以後，接到各地來稿和來信，對佛雄同志文中對於主席《到韶山》詩中“黑手高懸霸王鞭”句中的“黑手”的解釋，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不應解釋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罪惡的黑手”；這裏的“黑手”，仍系指“農民”而言。

新疆烏魯木齊第一師范殷薇同志在來稿中說，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手，“不會是黑的”；“不能因為這些人是黑暗勢力的代表”，“他們都長着一顆黑心，便把‘黑手’二字解釋成他們的手”。來稿認為，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話，“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來稿接着節引了《報告》中的一段話：“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游鄉……他們那粗兇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來稿認為：“這裏的‘粗黑的手’，也就是詩中的‘黑手’。”“在舊社會里勞動人民的手黑，正是統治階級苛酷壓榨的結果。”來稿同時節引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那段話來證明，認為主席這兩段話“正可幫助我們來体味和理解‘黑手高懸霸王鞭’一句詩的真義”。來稿並且舉出了戚克家同志的《罪惡的黑手》那首詩為例，證明“黑手”是指勞動人民。來稿最後說：“詩中的‘黑手’自然是指當年農民運動中廣大貧農群眾的手。”這“正是他們受盡了苦難和欺侮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農民運動中敢於首當其衝、打翻仇敵、將罪惡的‘霸王鞭’奪在自己的‘黑手’之中‘高懸’以對的，正是他們。”“他們高擎着從敵人手中奪得的鞭子，傲然而又怒不可遏地對着被踩翻在自己腳下的狗彘，看着

他們的作揖求饒。”“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王鞭”這兩句詩，就是用最精粹、最豪壯的形象的語言來描繪當年翻天覆地、倒海傾江的壯闊圖景的。”來稿認為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貧農大眾鬥爭地主時的勇敢堅決及其所獲得的勝利的贊頌，“正是‘黑手高懸霸王鞭’這句詩的最好的詮釋”。

本省南通縣三余中學巫德新來信說：“佛雄同志認為主席詩中的‘黑手’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罪惡的‘黑手’，是反動統治者對廣大農民鞭撻鎗烙，敲骨吸髓的‘黑手’。我以為對‘黑手’作這樣的解釋，有損於主席詩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意義。‘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王鞭’，正是黨領導湖南農民向地主階級進行轰轰烈烈的鬥爭的激動人心的情景的寫實。這裏完全是對農民偉大力量的贊頌。正象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寫的那樣：‘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游鄉……’就是這些從前被‘霸王’們‘打在泥溝里’的農民，現在站起來了，用那‘粗黑’的手，奪過‘霸王’們的鞭子，狠狠地把手裏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威風打了下去。在這裏我們絲毫看不到霸王們的反動氣勢，所看到的只是千千萬萬農民揚眉吐氣的神情。基於上述歷史事實，我覺得‘黑手’不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罪惡的‘黑手’，而是千千萬萬農民粗黑的有力的手。只有這樣的理解，也才與‘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敢’字氣勢合拍。”

本省武進縣三河口中學的梅德征在來稿中說：“我認為‘黑手’是指農民的手。‘霸王鞭’是地主階級鎮壓農民的武器。這句詩的本義是說農民奪取了地主的武器來武裝自己；用霸王鞭來對付霸王，‘即以共人之道，還治共人之身’。”“古人早就用‘黑手’來代表農民。在《劉知遠諸宮詞》中，就有過‘扶犁黑手番成笏’的句子。”